



蔡义江部分著作。

月轮山下 红楼梦里

记甬上才子、红学专家蔡义江

赵淑萍

2026年6月6日凌晨，蔡义江先生走了。消息像一粒石子投进静水，朋友圈里荡起细而深的涟漪——老杭大人、浙大人，不约而同地谈起他的学问，说起他的师表。字句之间，是深深的缅怀，仿佛又见当年先生戴着黑框眼镜在讲台上侧身指点，谈笑风生。

12年前，先生与夫人来甬，特意在月湖石浦设了一席。席间先生谈兴甚好，谈古论今，眉目间仍有少年意气。后来，先生几次寄来著作，亦有电话联系。那些信封，至今还珍藏着，实在是喜欢他那一手洒脱清俊的钢笔字，当然，他的毛笔书法也非常古雅。见面虽少，却是神交已久。

先生是潇洒的、幽默的，笑起来时带几分孩子气的俏皮。他的普通话虽有南方口音，说起话来却抑扬顿挫、满是激情，像在吟唱一阙旧词。音容笑貌，仿佛仍在眼前。

1 承家继学绍师风

蔡义江出生于宁波一个书香之家。家中兄弟姐妹十二人，皆有所成：有著名地热专家，有高级工程师，有校长、名师，而蔡义江则是红学翘楚。这个家族的精神底色，源自他们的父亲——蔡竹屏（笔名疾风）。蔡竹屏是一位满腹诗书、历经坎坷的爱国志士。

据李圣文在《我的舅父罗梦石》中回忆，甬上著名书画家罗梦石旧时乃一介穷儒，以卖字为业，书画之余种些瓜豆。某年蚕豆花开，白色花瓣缀紫黑花蕊，形似蝴蝶，煞是好看。邻家女童来摘豆花，罗先生心疼不已，急忙喝止。女孩边逃边回头望他，他尾随其后，直至一座乌漆大门前。从明堂走出一位和蔼慈祥的老者，正是罗梦石素来敬重的抗日志士蔡竹屏——那女孩竟是他的外甥女。蔡先生得知原委，连忙赔礼；罗先生反倒一脸尴尬，连称“没事没事……”二老相视拱手，哈哈一笑，芥蒂全消。这件小事，既见蔡竹屏的平易谦和，更显其家风之温厚。

蔡竹屏以古典文学研究与古籍整理见长。受父亲熏陶，蔡义江自幼便痴迷古典文学。父亲是他的第一任老师，也是他一生学问与人格的源头。良好的家学根基，加上天资聪颖与勤学不辍，使他早早崭露头角。后来，他被保送入读之江大学（杭州大学前身，今浙江大学）。

蔡义江一进校园，便听闻中文系最有名的教授是夏承焘。夏先生讲课，总是满堂笑声，外系的学生也来旁听，连过道和窗台边都挤满了人。可惜第一学期没有夏先生的课，蔡义江便自己想办法：他把夏先生所教各年级的课全抄在课程表上，上完正课就赶去别的年级旁听，“断断续续，东听一点，西听一点”。不久后，夏承焘注意到了教室角落里这个格外认真的学生，便问：“坐在角落里的这位小同学，是新来的一年级学生吧？叫什么名字？听得懂我讲的课吗？”蔡义江一一作答，说：“讲音韵的，有的不太懂，其余都听得懂，很有兴趣。”后来，系里安排夏承焘为他们开设“中国文学”（韵文部分）和“唐宋诗词”课，他欣喜异常。

蔡义江曾专门撰文回忆恩师夏承焘，里面有些非常生动的细节。比如，夏先生有一次讲到艺术上相辅相成、对立统一的道理，他在黑板上写了“鬼灯一闪，露出口口面”几个字，要学生们猜空着的两字是什么。有人猜“狰狞”，有人猜“青蓝”，都不是。夏先生缓缓写出“桃花”二字。“桃花面”本应娇艳无比，可黑夜鬼灯之下看见，那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，一下子就把艺术的妙趣点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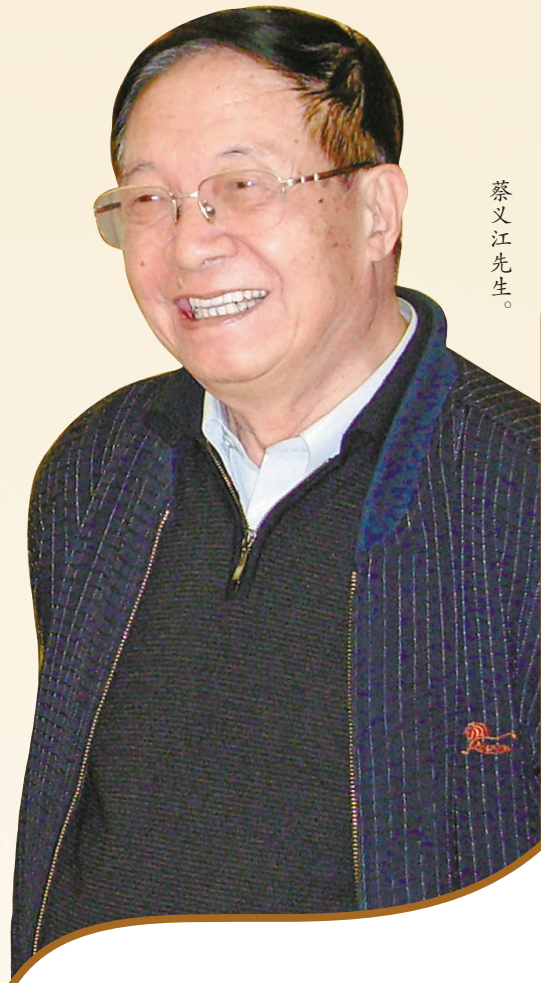
蔡义江不仅痴迷于夏先生的课堂，还常常登门拜访。坐下来，听先生说，先生也听他讲。夏先生手边常有一个小笔记本，谈天中只要觉得蔡义江转述的话或想法有点意思，便会记下来。老师听学生谈话而记笔记，实属罕见。夏先生还常说：“第一流的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往往是第二流的，而第二流的教师反而能教出第一流的学生来。”他解释道，学生太崇敬第一流的老师就容易迷信，不敢有别的想法，学得再好也总比老师差一等。这番教诲，正体现了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用心。

笔者与蔡先生在月湖石浦相聚那次，他谈到自己早年曾有其师夏承焘等名人的书信、作品，被一些采访者以拍照名义借去，事后未归还，他也没当回事。如今这些作品价格不菲，他倒不在乎什么价格，只是人老多情，常常思念故人——想想当初复印一份，看看也好。

正如蔡义江学生、中山大学教授黄仕忠所言，蔡义江先生是“才华横溢的古典诗词研究专家”。20世纪80年代的杭州大学中文系，在夏承焘、姜亮夫、胡士莹等大家之后，蔡义江与吴熊和等学者撑起了古典文学的天空。蔡义江才华的根基，正是夏承焘先生当年在月轮山下、之江岸边，一字一句、一点一滴浇灌而成的。蔡义江曾作诗纪念恩师：“尚余德业在人间，桃李栽成去不还。少小从游今老矣，梦魂犹绕月轮山。”



蔡义江及其父疾风、其弟蔡国黄的部分作品。（汪校芳收藏）



蔡义江先生。

3 一生痴绝为红楼

20世纪70年代，蔡义江奉命承担《红楼梦》诗词曲赋的注释任务。1979年，他的第一部红学专著《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，好评如潮。他选择“诗词曲赋”作为进入红楼的切口，这是独具慧眼的学术选择。《红楼梦》中的韵文不是点缀，而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——“按头制帽”，曹雪芹为每位人物量身定做的诗词，既是性格的诗意投影，也是全书伏脉千里的缜密密码。看不懂这些诗词曲赋，就无以领会这部巨著的精深微妙。

蔡义江的评注之道，在于始终把诗词放在小说整体中理解。他不仅用深入浅出的注释帮助读者扫除文字障碍，更联系全书和脂砚斋评语，引导读者在草蛇灰线中寻绎后半部佚稿的人物结局。此书累计印行逾百万册，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、威斯康星大学等列为汉文必读参考书。

此后，此书历经多次修订：1991年团结出版社再版，2001年更名为《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》，由中华书局出版，此后又有《红楼梦诗词品鉴》《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》等版本。一部学术著作畅销四十余年不衰，在红学史上堪称奇迹。

如果说诗词评注是蔡义江进入红学的“钥匙”，那么“探佚”则是在红学之林中开辟的学术高地。曹雪芹前八十回之后的散佚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大憾事，程高本后四十回在思想境界和艺术表达上与原著判若云泥。红学界一度出现“探佚”热，但“猜谜的，八卦的，联想丰富，无奇不有”。在热闹与浮躁中，蔡义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学术姿态。他认为“探佚是科学研究，而非创作想象”，走的是一条将评论、鉴赏和资料、考证相结合的路。

1989年，他的第二部红学著作《论红楼梦佚稿》面世。资深红学家吕启祥评价其“无空疏之弊、艰深之虞，于明白晓畅中使人得其要领”。其中用力最勤的《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》一文，运用小说线索、判词、脂评、明义题诗等多种材料，论证了林黛玉“泪尽而亡”的合情合理，并揭示续书“调包计”与贾母、王熙凤性格的前后矛盾。这种以考辨为基础的学术探佚，得到业内同行的高度赞誉。

随着研究深入，蔡义江又撰写了《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》《蔡义江解读红楼梦》《追踪石头——蔡义江论红楼梦》等著作。他对曹雪芹身世提出新见，认为畸零人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頔而非伯父曹颀，从年龄、评语内证、删改权威等多角度论证，剖析透彻。他还提出曹雪芹出生时家中早已败落，并未亲历由盛转衰的过程，而是从父辈口中得知那个秦淮边的逝去乐园，从而完成了创作。这些原创性观点为新红学考证派增添了新的学术维度。

如果说诗词评注是“入门之钥”，探佚研究是“纵深之掘”，那么《蔡义江新评红楼梦》则是他学术的集大成之作。

蔡义江很早就酝酿一个计划：整理一种接近曹雪芹原稿、最少讹误、便于现代读者阅读的《红楼梦》本子。1992年，他校注的《红楼梦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周汝昌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书评，认为“文化素养好，文学识力高”如蔡义江者，才是“最适合这种任务的‘注红’好手”。但蔡义江并未止步，他在等待一个更完美的本子。

2010年，《蔡义江新评红楼梦》首次出版，厚厚两册。吕启祥指出，《新评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醒读者认识《红楼梦》的本质——“为人生大梦，是繁华梦，不限于良缘梦”。蔡评突破传统“木石前盟”与“金玉良缘”的二元对立框架，将主题提升到对整个社会兴衰的宏观思考。这部著作融校勘、注释、评点于一体，既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展示，也是向广大读者普及红学知识的佳作。

进入晚年，蔡义江仍笔耕不辍。2013年，《红楼梦答客问》由龙门书局出版，以问答形式对《红楼梦》的创作基础、主题主线、研究资料、金陵十二钗、诗词曲赋等常见问题作出全面解答。2016年，他与袁行霈、葛兆光等人合著的《名家讲唐诗》由中华书局出版，展现了他在古典文学学者的另一面。同年，《务求真，明辨慎思——蔡义江教授访谈录》在《文艺研究》发表，系统总结了其学术思想。

2022年，《蔡义江新评红楼梦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典藏本，2023年推出全四册版，版本校勘扩充至十二种。这一版采用十二种版本互校、择善而从，全书包含五个部分：一百二十回正文；旁批（含重要脂评及蔡义江的逐字点评）；注释；回前题解；前八十回回后总评。全书近二百万字，包含上百万的评点文字，其规模和深度超越以往，具有集成的性质。2024年，《红楼梦答客问》再版。这些成果构成了他学术生涯的“收官”阶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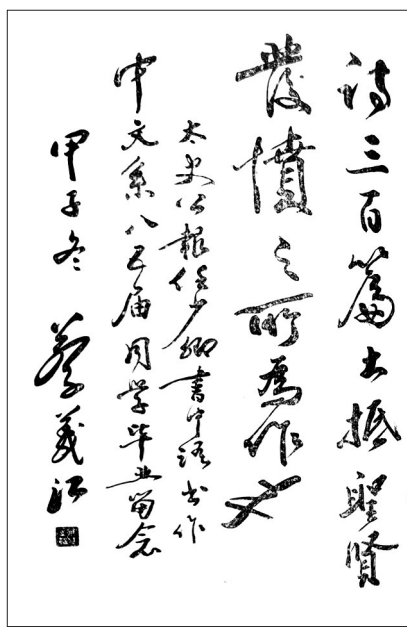
蔡义江先生一生著述三十余种，在红学研究及唐宋诗词研究两个领域均取得卓著成就。他的学术品格——务求真、明辨慎思，使他在红学喧嚣中如定海神针般屹立不倒。从《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》到《论红楼梦佚稿》，从校本《红楼梦》到《蔡义江新评红楼梦》，每一部著作都体现了“将思想研究与艺术欣赏结合、将文本细读与宏观把握结合”的学术追求。

今天，蔡义江先生虽已远去，但那部印行逾百万册的诗词评注，依然是无数“红迷”案头的必备之书；那部近二百万字的《新评》，依然是后世学者深入研读的重要参考；那部探佚研究的经典之作，依然是探佚学领域不可绕过的学术存在。他以一生践行了“此身合在红楼住”的学术誓言，以文字为桥，引领一代又一代读者走入红楼深处，探寻那草蛇灰线间的大梦繁华。（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）

1954年，蔡义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。他是许多学生的偶像，讲课几乎不用讲稿，口若悬河，诗人故事和诗歌作品信手拈来，绘声绘色。

学生叶向群回忆，他于1981年秋季入读杭州大学中文系，蔡义江教他们古典文学。“第一次授课的场景，时隔45年，依然历历在目：那时他不到50岁，戴黑框眼镜，围一条《青春之歌》中卢嘉川式的长围巾，微笑着从大教室右门进来。与我们作短暂目光交流后，转身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写了起来。应该是一首唐诗（内容已不记得），他从黑板右侧起笔，从右到左，自上而下，逐列书写——那是在小学、中学课堂上从未见过的典雅书写方式。挥写间，脖子上的围巾滑落下来，他帅气一甩，围巾又服服帖帖地搭在他的肩膀上。那会儿，我们的老师中不乏学富五车的大家，但像蔡老师那样上课能磁吸般‘吸’住学生的，却也屈指可数。他是那种才子型学者、魅力型老师。”

叶向群还记得，毕业前夕，学校送给1985届中文系108位毕业生人手一本纪念册。纪念册扉页上，有当时学校几位名教授的手书题赠。其中蔡义江抄录的是《太史公报任少卿书》中的话：“诗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他说，不难看出，蔡先生是想借“发愤著书”的经典之论，寄寓砥砺心志之意。而他的行草，笔法纯熟，功底扎实，是典型的学者文人字。



蔡义江在学生毕业纪念册上题赠的是《太史公报任少卿书》中的话：“诗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

著名书法家任平，也是蔡义江的学生。他回忆道：“蔡老师讲课非常生动，同学们都喜欢听。他分析透彻，见解独到，是一位有思想的学者。”而且，蔡老师精通书法，任平搞书法活动，蔡老师也会来参加并作指导。

孟志斌在《蔡义江先生的一封信》中回忆，他当年是河北任县农业技术中学的教师，冒昧写信向蔡义江请教《红楼梦》版本问题，本不抱希望，不料很快收到了先生措辞温雅、亲笔书写的详尽回信。

也曾有年轻学者在文章中引用了先生的论断，蔡先生看到后，不仅不以为忤，反而亲自致电鼓励，言语间满是欣慰。

1986年，蔡义江离开高校从事民主党派和出版工作，却始终未曾离开他所热爱的古典文学研究。而那一方讲台上的风采，永远留存在学生的记忆深处。